

朱元璋研究

陈 梧 桐 著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K827.48/10

陈 梧 桐 著

朱元璋研究



S131454/09

天津人民出版社

序 言

陈梧桐同志的《朱元璋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朱元璋研究》所包括的十六篇论文，是陈梧桐同志几年来研究朱元璋的丰硕成果。作为中年的明史专家，梧桐同志造诣很深，他不但详细占有史料，而且比较善于进行理论分析，文字表达能力也很好，因此，这些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有独到见解，是一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

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领袖，又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一生的前期和后期兼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属性。在前期他不愧为杰出的农民领袖，后期他又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比较杰出的封建皇帝。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对他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仅就新中国建立以后，对朱元璋评价的文章不下百篇，这些文章对深入研究朱元璋无疑是有益的。但无可讳言，大部分论者由于研究课题或其他原因所限，多只能从某一个角度对朱元璋作出评价，很难看出朱元璋其人的全貌。而梧桐同志对朱元璋的研究却是从各个不同角度入手，例如，对作为农民领袖的朱元璋，从他的阶级出身、起义的动机、根据地的建设、政权的性质、蜕变的过程和原因，以及他削平群雄、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历史功绩等方面，都作

了系统的论述；对作为封建帝王的朱元璋，作者结合明王朝建立的历史条件，对他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及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也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此外，还对朱元璋的军事思想、治国思想及其一生的功过等问题另立专论，进行分析和评价。因此，《朱元璋研究》这本书，对他一生得失的评述，将是比较全面和系统的。

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在他编订的我国第一部成型史书《春秋》里，就对鲁国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各种人物的表演，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褒贬。而《史记》则用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不论是“纪”还是“传”，都包含着作者对纪主和传主的评价。汉以后的史书，虽然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诸种写法，但仍然以历史人物活动作杠杆，贯穿着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但是，剥削阶级的史学家，由于视野和阶级局限，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不免有所偏颇，很难做到客观。新中国建立之后三十多年间，我们的史学工作者虽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并对许多人物重新作出评价。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较长时间，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了片面的理解，认为历史人物的作用取决于他们的阶级地位，把划分阶级属性当作阶级分析方法，对帝王将相大多加以否定。这样一来，对曾经是农民领袖又是封建帝王的朱元璋，就很难作出客观的评价。不少论者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对他大加挾伐，完全否定他的历史功绩，这就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但农民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因此，农民战争只能起到推翻和打击腐朽

的旧王朝的作用，却不可能导致农民阶级的解放。朱元璋领导的起义队伍推翻了腐朽的元王朝，这是历史的功绩，应当垂勋史册；朱元璋在推翻元王朝之后，建立了明王朝，实行轻徭薄赋，改革吏治，发展生产，使封建社会的历史向前发展一步，这同样是历史的功绩，也应垂勋史册。朱元璋从一个农民领袖变成一个农民的统治者，他有着压迫剥削农民的一面。但这是历史的局限，只要他当了皇帝，就必然是农民的对立面，这是不能以朱元璋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用朱元璋从农民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这个问题来否定朱元璋的历史功绩，并不是科学的态度。对朱元璋的评价，在他建立明王朝之前应当用衡量农民领袖功过的标准来对他作出评价；在建立政权之后，则应用衡量封建帝王功过的标准来对他作出评价。《朱元璋研究》这部著作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者用辛勤搜集的丰富历史资料，对农民领袖的朱元璋和封建皇帝的朱元璋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朱元璋的历史作用，也指出朱元璋的历史局限。

梧桐同志锲而不舍的勤奋治学精神是很值得称赞的。我曾经和梧桐同志做过邻居，那时我们住房条件还很差，他们一家人就挤在两间不到十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虽然工作条件很差，但梧桐同志坚信：只要发奋读书，努力钻研，一定能做出成绩。他几乎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苦读到深夜；他翻阅了大量有关明代历史的资料，写出一篇篇有见解的文章。现在，梧桐同志住进了楼房，条件比原先好多了，我也搬了家，我们已经不再是邻居了，但是，梧桐同志在狭小的平房里艰苦奋斗的情景，却是令人难忘的。如今梧桐同志已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明史专家，继《朱元璋研究》完稿之后，应天津人民出版

社之约，正在写朱元璋的大传，我预祝他取得成功。

《朱元璋研究》是一部学术著作，它的出版有助于朱元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由于《朱元璋研究》材料涉猎很广，了解元末农民战争和明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帮助，加上本书文字生动晓畅，可读性较强，除专业历史研究者之外，其他历史爱好者也是可以读一读的。

上面这些话，是为祝贺梧桐同志《朱元璋研究》的出版面写的，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苏双碧

一九八六年二月

于北京沙滩

目 录

论朱元璋的起义动机及其对元末农民战争的贡献·····	(1)
朱元璋对陈友谅与张士诚的战争述评·····	(26)
论朱元璋取得反元斗争胜利的原因·····	(54)
论朱元璋的蜕变·····	(79)
论朱元璋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	(101)
论朱元璋的文化专制·····	(140)
明《大诰》与朱元璋封建专制的强化·····	(156)
评朱元璋整肃吏治的措施·····	(171)
评朱元璋对人才的使用与摧残·····	(195)
论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	(213)
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243)
论朱元璋的治国思想·····	(264)
朱元璋军事思想初探·····	(291)
关于朱元璋功过评价的几个问题·····	(310)
关于朱元璋起义军“寨粮”、“检刮”若干问题	
的辨析·····	(329)
明初空印案发生年代考·····	(337)
后记·····	(339)

论朱元璋的起义动机及其 对元末农民战争的贡献

朱元璋（1328—1398年），原名重八，后名兴宗，字国瑞，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人，佃农家庭出身。十七岁时，在“家道惶惶”的情况下“托身缁流”，剃发为僧，曾到淮西流浪三年。二十四岁时，即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首领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组织红巾军，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

元末农民战争同历次农民战争一样，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的爆发，是元朝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长期发展、激化的结果。由于元朝统治者在全国推行残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把国内各民族划为四个等级，规定各自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经济负担，推行社、甲制度，禁止汉人、南人养马、执兵器，禁止汉人集会、结社等等，民族矛盾一直十分尖锐。但是，忽必烈在统一全国之后，开始全面采用“汉法”，进一步推动蒙古贵族的封建化，保护并继续发展北宋以来没有受过金

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的汉族地主的封建经济。蒙古地主逐步合流，互相勾结，疯狂兼并土地，“索债征租，驱迫农民”^①，甚至“干预男女婚姻”，将佃客随田佃卖^②。他们对各族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③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制约和影响其他社会矛盾的发展。针对这情况，起义军提出“复宋”的民族斗争口号，同时发布檄文，揭示了“贫极江南，富称塞北”^④的不平等现象，并提出了“摧富益贫”^⑤的阶级斗争口号，力图把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阶级压迫的任务联系起来。一时“贫者从乱如归”^⑥，江淮大地“短衣草履”的劳苦大众，“齿木为杷，削竹为枪”^⑦，纷起响应，很快形成“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⑧的大好革命形势。

起义爆发的第二年，即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在濠州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充当一名普通的步卒。后来，他屡立战功，成为郭子兴的亲兵，很快又升任镇抚、总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病死，他便成为这支起义队伍的实际统帅，旋即挥师南渡长江，于次年攻占集庆，改集庆为应天府。此后，他着力经营以应天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积粮训兵，不断扩充实力，最后终于扫灭群雄，推翻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八。

②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卷五七，《刑部》一九。

③ 危素：《危太朴文续集》卷九，《书张承墓传后》。

④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⑤ 《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黄镇成撰碑》。

⑥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⑦ 《元史》卷一九四，《魏中立传》。

⑧ 朱元璋：《纪梦》。

元朝统治，建立了明王朝。

由于朱元璋的经历非常复杂，在元末农民战争中，他既完成了推翻元朝统治的任务，又最后葬送了这场农民战争，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因此，如何评价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活动，也就成为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课题。在讨论中，有些同志把朱元璋的活动及其作用贬得很低，甚至只言其过而不言其功，根本否认他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这种看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二

否定朱元璋的农民阶级出身，往往是某些同志否定朱元璋的起义动机并进而否定他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活动的前提。他们或者认为朱元璋并非完全出身于能吃苦耐劳的职业农民家庭，或者虽然承认他是农民出身，但又认为他在淮西流浪三年，已染上好逸恶劳、贪求享乐的恶习，变成一个游民，形成了流氓无产者的性格，从而推论他的起义动机不纯，断言他不是农民起义领袖。

事实究竟如何呢？史载朱元璋“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①。他家自“上世以来，服勤农业”^②，给地主当佃户，有时也打长、短工，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他的父亲屡遭地主夺佃，在钟离被迫数次搬家，从东乡迁至西乡，又再迁至孤庄村，生活极其困苦，常“取草

① 《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② 郎瑛：《七修类稿》卷七，《朱氏世德碑》。

之可茹者杂米以炊”^①。朱元璋出生时，家里穷得连块给他包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幸好从河里捞到一块烂绸布，才勉强为他包裹了身子，美其名曰“红罗裤”^②。由于先天营养不良，他“婴孩时多疾”^③。稍稍长大，就被迫去给地主放牛，以便减轻家庭的负担。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刚十七岁，天灾瘟疫相继袭来，父、母、长兄病饿而死。“时家贫甚，谋葬无所”^④，向地主刘德求地安葬，却遭到刘德“呼叱昂昂”的斥责，还是邻居刘继祖悯其孤苦，予地以葬。此时的朱元璋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据他后来的回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遭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无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⑤后来亏得邻居汪氏母子“备醴馨香”，央求皇觉寺（又称于皇寺、于觉寺）长老高彬，把他收为小行童，在寺里干粗杂活，才使他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试问，朱元璋的父、兄，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出卖劳动力为生，没有丝毫的土地和分文的资财，终年辛苦，却生不得温饱，死无地葬身，这不算是能吃苦耐劳的职业农民是什么？朱元璋出生在这个佃农家庭，从小为地主放牛，十七岁祝发为小行童，又是干着粗活杂差，吃着残羹剩饭，他不算是贫苦农民的一分子又是什么？

朱元璋在皇觉寺当小行童刚满五十天，寺主以岁歉不足给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② 吕毖：《明朝小史》卷一，《红罗裤》。

③ 《天潢玉牒》。

④ 《天潢玉牒》。

⑤ 朱元璋：《皇陵碑》

众食为由，遣散众僧，“俾各还其家”。无家可归的朱元璋，仰天茫茫，“乃勉而游食，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颍州”^①，当了三年游方僧。当时白莲教教主彭莹玉正在淮西秘密传教，从事农民起义的准备工作。吴晗的《朱元璋传》推论朱元璋在那里“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②，对这一点我们一时找不到史料可以作证。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朱元璋当了游方僧，过了三年流浪生活，就肯定他必然染上好逸恶劳、贪求享受的恶习，随意给他戴上一顶游民的帽子。彭莹玉也是一个游方僧，流浪的时间比朱元璋更长，但他并没有染上这种恶习而成为游民。游方僧不见得个个都是游民，要把朱元璋划为游民必须有事实根据。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谁找出一条足以说明他当三年游方僧之后，已染上好逸恶劳、贪求享受的恶习，从而变成游民的史料来。

大量的史料却证明，朱元璋经过三年流浪之后，依然是保持勤奋勇敢、朴素节俭的作风的。突出的事例如：他在参加农民起义后，“每遇敌，智勇奋出，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军中有所得，上皆无取，辄令分给群下。”^③他的日常生活，处处躬行节俭。“旧衣皆澣濯更进”，以致参议宋思颜连声称赞：“真可以示法于子孙也”^④。方国珍献金玉饰马鞍轡，他通通回绝，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⑤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饷

① 《天潢玉牒》。

② 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5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

④⑤ 《明太祖实录》卷九。

金床进，他命毁之，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①营建应天新内城，他下令不许雕饰，有官员说瑞州出产有花纹的奇石，琢之可以甃地，遭到他的严厉训斥：“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②朱元璋的这些表现，与“处兵戈间而急于珍宝”^③的陈友谅、“上下嬉娱以至于亡”^④的张士诚，是大不相同的。说他好逸恶劳，贪求享受，是与事实相左的。

而且，即使是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这种勤奋、俭朴的作风也依然保持。他办事勤谨，每日天不亮即起床批阅章奏，处理国事，一直忙到深夜。洪武十八年（1385年）“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⑤，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两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生活上，朱元璋仍处处躬行俭朴。改建大内宫殿，他下令：“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⑥回回商人进献番香阿剌吉即中国所说的蔷薇露，谓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他“却不受”，说：“中国药物可疗疾者甚多，此特为容饰之资，徒启奢靡耳。”^⑦有一散骑舍人穿一套价值五百贯的鲜丽新衣，他大加训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切戒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

③ 孔迳：《云蕉馆纪谈》。

④ 《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

⑦ 《明太祖实录》卷七九。

之！”^①据传，朱元璋曾将唐人李山甫《上元怀古诗》“大书置屏间”，“有暇则吟哦不绝”，其诗曰：“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②这表明朱元璋是随时注意切戒奢靡的，尽管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重蹈那些无道昏君的覆辙，求得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可见，所谓朱元璋在淮西流浪三年染上了好逸恶劳、贪求享受的恶习，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据此而得出朱元璋已变为游民即流氓无产者的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

对朱元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动机，有些同志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朱元璋自投奔起义之日起，便是代表地主反元以重建汉族地主的封建政权，就是说，他是抱着帝王野心参加起义的。还有同志认为，他是怀着冒险甚或是撞大运的心情参加起义军的。总之，朱元璋参加起义是别有企图的投机活动，他是农民革命的投机分子。

这种看法的证据是十分薄弱的。从朱元璋亲撰的《世德碑》、《皇陵碑》和《纪梦》中，我们看不出他参加起义时即怀有帝王野心的蛛丝马迹，而被用来证明这种论点的史料，又都经不起仔细推敲。如嘉靖年间成书的《尤兴慈记》载：“圣祖幼与群牧儿戏，以车辐版作天平冠，以碎版作笏，令群儿朝

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五。

② 吕毖：《明朝小史》卷二，《书诗屏间》。

之，望见俨然王者。”这常被用以证明朱元璋幼时就羡慕皇帝的无尚尊严。但该书作者王文禄明白交代：此系“自幼闻慈淑母氏言国初遗事”^①。这说明它是一则民间流传的趣闻轶事，并非信史，不可遽信。退一步说，就算它是信史，那也不过是一出儿戏，并不足据以断定朱元璋自小就怀有帝王野心，就象现在有些儿童看了某个电影、戏剧后，仿模其中的故事做起扮演帝王将相的游戏，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们自小怀有帝王将相的野心一样。《明史》的《太祖纪》载，朱元璋起义前，卜于神，辞曰：“毋得举大事乎？”这里的“举大事”三字说的是参加起义这件事，并不涉及具体的起义动机，有同志却硬说这三个字就是指打天下，做皇帝，这显然是一种穿凿附会。《国初事迹》载，邵荣与赵继祖企图谋害朱元璋被执，朱元璋责之曰：“我与尔等共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这似乎是朱元璋怀抱帝王野心投奔起义的一条有力证据。你看，“为一代之君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帝王思想吗？不过，这句话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说的，此时朱元璋已在向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蜕变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它与其说是朱元璋当年起义动机的表白，不如说是朱元璋此时倾慕帝王宝座心迹的写照。其实，朱元璋由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帝王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帝王野心的明显流露是在渡江攻占集庆之后，《明史》谓：“当是时，江左兵势日盛，太祖以汉高自期”^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当然，在渡江之前，朱元璋的帝王思想无疑已在潜滋暗长，但没有任何确凿

① 王文禄：《龙兴慈记》。

② 《明史》卷一三五，《孔克仁传》。

的史料可以证明他自投奔起义之日起即怀有帝王野心，就是朱元璋本人也多次申明：“初起乡土，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①，“朕年二十四（按：应为二十五），盘桓求生而已，不谓遂有天下。”^②我们不能因为朱元璋最后蜕变为封建皇帝，就前挂后联，全盘否定他的起义动机。

至于仅仅根据《皇陵碑》、《纪梦》称官军是“顺”，是“吉”，称农民起义军是“逆”、是“凶”，就断定朱元璋当时对历史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是怀着冒险甚或是撞大运的心情参加起义军的，结论也是下得过于轻率的。众所周知，朱元璋写《皇陵碑》和《纪梦》是称帝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他早在《平周榜》中就公开咒骂白莲教是“妖言”、“凶谋”，诋毁农民起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③。稍后，他又下令对其辖境内的其他义军进行镇压，规定：“凡有司官杀获‘贼’者，一次给赏绮帛三匹，二次加倍，三次县官升州官，州官升府官，府官别议之。民能杀获，亦量功赏赉”^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底将小明王沉没于瓜州江中后，他便千方百计掩盖自己过去同宋政权及红巾军的关系，把有关的史料尽加销毁或篡改，连当年镇江郡人在城西立的一块《叙太祖功迹》碑，因“文末写龙凤年号”，也下令捣毁^⑤。如今，朱元璋既已登上大明皇帝的宝座，自认为是元朝法统的合法继承者，而视农民起义为寇仇，在《皇陵碑》、《纪梦》中称官军为“顺”、为“吉”，称农民军为“逆”，为“凶”，就一点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八。

② 《皇朝本纪》。

③ 吴宽：《平吴录》。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⑤ 刘辰：《国初事迹》。

也不奇怪了。因此在没有其他史料可资印证的情况下，只凭这几个字，就断定朱元璋投奔起义时对形势毫无认识，纯粹是冒险或撞大运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朱元璋参加起义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朱元璋最初参加起义，虽然杂有追求荣华富贵的欲念，但推动他参加起义的主要原因，则是不堪忍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也就是说，朱元璋之所以参加起义，主要是为了反抗封建的剥削压迫，争取自身的生存条件。前面说过，在十七岁之前，朱元璋生活在一个佃农家庭，深受元朝黑暗统治和地主残酷剥削压迫之苦，这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贫苦农民的思想烙印，埋下了对封建剥削压迫的仇恨种子。以致到当了皇帝后，他还难以忘怀小时的痛苦生活：“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之”^①，不时想起过去对元朝官吏的忿恨情景：“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更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②。后来游食淮西，朱元璋的生活更加悲惨痛苦，在《皇陵碑》中他曾作过这样伤心的描述：“朝突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跽，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伴。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三年后，他怀着一颗思乡之心，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重返皇觉寺，又当了四年供人驱使的下层僧徒。至正十二年（1352年），即刘福通在颍州起义的第二年，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人在濠州起义响应，元朝遣彻里不花率骑三千前来镇压。这支官军驻营濠州城南三十里，“声攻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八。